

社会大学评价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殷新

(中南大学人事处,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大学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就是对大学教育质量进行监督。正因为大学评价是监督, 在市场经济主导的国家, 社会大学评价是不可或缺的。文章论述了中国社会大学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监督地位的依据和监督地位的确立, 探讨了社会大学评价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 大学评价; 高等教育; 监督地位; 依据

[中图分类号] G40-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1)04-0035-04

大学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对大学教育质量进行监督和导向。大学评价有三种类型: 一是各个大学进行的教育质量的自我评价; 二是社会民间对大学教育质量进行评价(简称社会大学评价); 三是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教育质量进行评价。正因为大学评价是监督, 在市场经济主导的国家, 社会大学评价是不可或缺的。这种不可或缺, 是一批执着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中介机构经过 20 多年始终不渝地努力才争取到的, 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导向, 从而使社会大学评价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获得的。本文从中国社会大学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监督地位的依据、监督地位的确立和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

一、中国社会大学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监督地位的依据

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由谁来进行监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要从三个层面来考虑: 一是政策, 二是法律, 三是文化。从时效性来说, 政策是最快的, 法律是滞后的, 文化是守旧的。目前, 中国社会大学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监督地位的依据是政策。

中国社会大学评价的政策依据就是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 年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意见》、2002 年科学技术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

的《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2010 年 7 月 30 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 因而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大学的排名进行探索。在《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意见》中, 要求“社会各界要积极支持直接参与高等学校的建设、人才培养、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评估”。在《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中, “深化与高校相关的科研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的“改进和完善科研评价制度”条款提出: “改变科研评价工作中的急功近利倾向, 逐步培育和依托社会中介组织开展评价活动, 建立独立的社会化科研评价体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第四十条规定: “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

由于这段时间的大学排行榜的依据只在政策层面, 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也就是说, 这些政策只是想改革的人的想法, 不是大多数人的想法。而《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条“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 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由其组织的评估”则明文规定, 评估工作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完成。因此, 在 1987~2000 年间,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所、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所高校比

[收稿日期] 2011-03-16

[作者简介] 殷新(1974-), 男, 湖北广水人, 博士研究生, 中南大学人事处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较研究课题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广东分院和网大(中国)有限公司的大学排名先后在媒体上发布,引起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和教育主管部门最高领导的关注,各种责难也蜂拥而至。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就是: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大学排名也是一样。中国需要大学排名榜:一是2000年前后的大学合并完全打乱了原来的大学次序,需要有一个重新认定,而政府又来不及也不可能进行这项工作,只好求助大学排名榜;二是1999年以来的扩招,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广大的中学生及其家长需要了解各个学校的情况,也需要一个大学排名榜;三是国家在进行大学选优资助时需要民间提供信息,以备决策时参考。因此,2001年以后发布大学排名榜的机构明显多起来了。

但是,这些大学排名榜由于得不到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充足的高等教育信息,加之进行大学评价的人员对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认识不同,其评价大学的指标体系各异,从而使一所大学在各个排行榜中的名次相差甚远。这就为反对者提供了反对的依据。最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黄因慧提交提案^[1],建议规范中国大学评价和排名。在这个提案中,黄因慧建议“这个工作只能由教育部来做!”“禁止民间组织对高校进行排名。”这个提案经人民网发布以后,在全国各网站、各媒体掀起一股反对民间大学排名榜的高潮。其实,对民间大学排名榜的质疑从来没有间断过。社会上似乎是一边倒的反对声音,同情者寥寥无几。其实,这是一种假象。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人是需要排名榜的;他们反对的是与己有关的大学在排名中靠后的大学排名榜;对于有利于自己的大学排名榜,则采取默认的态度。这种“只要民间发布新的大学排名榜,或者哪个大学排名榜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大学排名的主办者就会受到质疑、谴责,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一直存在。例如,2006年,某评价机构发布中国民办大学排名榜,就因为某个很有‘名气’的大学排名靠后,就利用媒体大做文章,并用了“骇人听闻”的醒目标题:中央及各省媒体围剿“大学排名榜”;又如,2009年5月5日由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和张炜撰写的“大

学排行榜真有‘潜规则’?”^[2]一文,又掀起了质问大学排名榜公信力的新高潮。一时间,全国几乎所有报刊和网站都卷入这场声讨中。但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教育部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名榜,坚决反对借此向高校拉赞助。

二、中国社会大学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监督地位的确立

中国社会大学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监督地位的确立有三种表现:一是公信力越来越高;二是市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三是社会舆论越来越好。

1. 大学排名榜的公信力越来越高

公信力不断提高是中国社会大学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监督地位确立的最好见证。中国社会大学评价起步较早,中国科学计量学的创始人赵红州和蒋国华用科学计量指标对大学进行排序,并于1987年9月13日在科技日报上推出,其名称就是“我国科学计量学指标的排序”。从此,中国社会大学评价的发展进入起步期。到1993年以后处于停滞期,直至1998年。1999~2009年是发展期,2010年以后是成熟期。

在起步至发展期的初期,大学排名榜都没有公信力可言。针对社会各界的质疑,中国社会大学评价人员不断地修正、补充评价指标及其权重,使“中国大学排名榜”日臻完善,公信力日见提高。例如,中国校友会网的大学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就是与时俱进。为了改变目前大学排名榜“重理轻文”的倾向,中国校友会网从2007年开始增加了“杰出社会科学家”指标。为了平衡以工学为主和以理学为主学校的评价指标,从2008年起增加了N&S论文指标。为了鼓励学子关注母校的发展,从2011年开始,增加校友捐赠指标。又如,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所的评价指标体系由2001年的2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8个三级指标逐渐完善至2010年的2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27个三级指标。

中国社会大学评价机构都在对评价指标体系或者评价对象作出调整,使评价更符合实际,从而使大学排名榜的公信力不断提高。其公信力在2005年约为10%,2006年是37.7%,2009年是39%,2010年达到61.25%^[3]。这表明,中国社会大学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监督地位已经确立了,中国社

会大学评价是成功的，已经步入成熟期。

2. 中国社会大学评价的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

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有三个表现：一是大学排行榜越来越多；二是以介绍大学排行榜为高考考生提供报考指南的书籍发行量越来越大；三是介绍大学排行榜的网站和报刊越来越多。

上世纪 90 年代，只有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广东分院和网大（中国）有限公司 2 家评价机构发布大学排行榜，到本世纪初又有中国校友会网、武汉大学的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等 5 家机构发布大学排行榜了。

从以介绍大学排行榜为高考考生提供报考指南的书籍看，2002 年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首次发行《挑专业 选大学》时，发行量不到 1 万册，到 2010 年达到 2 万册。另外，从 2006 年开始，武汉大学的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以介绍大学排行榜为高考考生提供报考指南的书籍发行量也有 6000 册左右。

从以介绍大学排行榜为高考考生提供报考指南的网站看，上世纪 90 年代只有网大一家，社会上的门户网站不予理睬。2001 年，人民网开始报道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发布的大学排行榜，并从 2001 年起长年挂网备查；随后新浪-教育、搜狐-教育、腾讯-教育也常年挂网备查。从 2010 年开始，人民网还对中国校友会网的 800 强排行榜、网大的 100 强大学排行榜、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 50 强排行榜也长年挂网备查；新浪-教育也对中国校友会网的大学排行榜长年挂网备查。各种大学排行榜发布时，各大门户网站都及时刊登。

最后看以介绍大学排行榜为高考考生提供报考指南的报刊。上世纪 80 年代只有科技日报、《瞭望》周刊、楚天周末全文刊登，90 年代只有广东（广州）科技报全文刊登；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青年报、科学时报、21 世纪人才报、21 世纪经济报道全文刊登。此外，人民日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湖南日报、香港大公报、台湾东森新闻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 100 多家报刊在排行榜发布时进行过报道。

3. 中国社会大学评价的社会舆论越来越好

中国社会大学评价的社会舆论越来越好的标志是 2009 年 5 月在对大学排名“潜规则”质疑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声音：《缺乏监督的大学排行榜必腐，但不宜因噎废食》《排行榜的缺点还不足以让它灭亡》《大学排行榜：不能因“潜规则”而剥夺“表达权”》等一系列文章相继发表。舒圣祥在《给大学排名是不容禁止的自由权利》一文中指出：“大学排行榜背后的‘钱名交易’早已尽人皆知，舆论抨击一则指向制榜者的利欲熏心，一则指向高校的媚态讨好。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现实，现在的问题在于：教育部门该如何处置弊端多多的大学排行榜？教育部已经表示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行榜，并坚决反对借此向高校拉赞助。”

但是，天津大学校长认为《不宜禁止大学排行榜》，其理由是强调大学排行榜的有用性，即能够为公众了解和选择大学、了解和选择专业提供某种帮助。他强调：“即使公众对于大学排行榜没有任何需求，即使大学排行榜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认为政府部门也是无权禁止的。作为自由权的一种，任何人都无权不受干涉地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大学进行排名。”^[12]

三、中国社会大学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大学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表现在：被高考考生及其家长参照大学排行榜来填报志愿；大学应用大学排行榜来促进发展；政府部门对大学进行定位时参考大学排行榜。

1. 参照中国大学排行榜填报高考志愿

2006 年，上海中智库玛借助网络调查平台（www.51poll.com）在全国 33 个省份的 56 个城市作了一次在线调查，共有 19 867 名不同职业、性别、年龄的人参加。其中，学生占 34.30%，教师占 22.75%，家长占总人数的 62.8%。结果显示：中国有 94.35% 的学生家长会参照“中国大学排行榜”来协助孩子填报高考志愿；85.84% 的老师建议学生填报志愿时参考“中国大学排行榜”。

2. 高校应用大学排行榜来促进发展

高校应用大学排行榜来促进发展主要体现在应用单项论文指标的大学排名上。各学校对发表论文特别是发表 SCI 论文的单项指标的大学排名重视程度不同。SCI 论文单项指标的大学排名促进了高

校不断推出激励发表论文的措施，从而提高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

例如，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所 1987 年发布的《我国三十个大学的科学计量排序》中，清华大学位列第 17 名，这个“17”深深地触动了清华大学。经过 14 年的努力，清华大学 SCI 论文在 2001 年以后的全国高校排名中稳坐第一，SCI 论文的引用篇数在 2003 年以后在全国高校排名中也是第一。

在努力的过程中，清华大学制定了“攀登计划”和“千篇工程”。所谓“攀登计划”，就是一个“用 SCI 论文作评价标准，到 2000 年之前进入世界高校前 200 名”的目标。所谓“千篇工程”，就是一个到 2000 年 SCI 论文要超过一千篇的计划。

3. 政府部门对大学进行定位时参考大学排行榜

政府部门对大学进行定位时一直参考大学排行榜，是因为大学排名对优先发展的大学顺次的重新确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体制的建立确实有参考价值。

国家教委研究生工作室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3 年的增刊上刊登了《96 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及其确定的时间》一文，是一篇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献。96 所全国重点学校及其确定的时间是一个学校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国家重视程度的标志。经过 30 来年的发展，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大学格局大变样了：1954 年确定的 6 所全国重点大学在 1998 年的 985 工程大学计划 9 所中能够保留下来的只有 3 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另外 6 所是在 1959 年确定 10 所中的 4 所：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在 1960 年确定的 43 所中的南京大学，在 1963 年确定 3 所中的浙江大学。1954 年确定的 6 所全国重点大学中的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在 1998 年前的各种大学排名中相当靠后，而北京医科大学要与北京大学合并，因此，这 3 所大学都未能进入 985 工程大学计划中的“9 所”。而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在 1998 年前的各种大学排名中都在 10 名以内，中国科技大学在 SCI 论文排名中和浙江大学在综合排名中非常靠前。那些在确定全国重点大学较晚的大学能进入 985 工程大学“9 所”，都是在各种大学排名中靠前的。可以说：这些学校能进入“9 所”，大学排名功不可没。

从合并办学动机来看，无论是政府倡导还是自身生存或发展的合并办学，也不是多多益善，而会受到布局的限制。中央最初的意图是在东中部每个省、市都建立一所“航空母舰”式的综合性大学，从中挑选 10 所大学第一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适应“一流经济要由一流大学来支撑”的需要。但是实践的结果不尽人意。例如，武汉大学与华中理工大学的合并以及天津大学与南开大学的合并未能成功。上述学校在各种大学排行榜中都处于全国前 10 名或 20 名左右，而且两两的位次在同一的大学排行榜中靠得很近。也就是说，它们的实力很强，而且两两相当，都是教育部直属学校。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原 9 个部委管辖的学校，在进行合并时的先决条件是它们在各种大学排名中的名次相差很大、学科互补，而且都是有危机感的。其次是自愿，不是拉郎配。

可见，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大学格局和优先发展的大学顺次到此重新确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体制已经建立，大学排名在上述“重新确立”和“已经建立”的过程中是起了参考作用的。

参考文献：

- [1] 袁祖君. 政协委员黄因慧：禁止民间组织进行大学排名 [N]. 北京青年报，2003-03-10.
- [2] 赵亚辉，张炜. 大学排行榜真有“潜规则”？ [N]. 人民日报，2009-05-05（11）.
- [3] 教育时评. 每年一度的中国大学排行榜该不该办 [EB/OL]. <http://www.sina.com.cn>：，2005-02-28.

[编辑：苏慧]